

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

20世纪中国科学界的人与事

h



i



s

t



o

20th
CENTURY

Scientists



熊卫民 著

r



y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20th
CENTURY
Scientists



对于历史, 科学家有话说

20世纪中国科学界的人与事

熊卫民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20世纪中国科学界的人与事/熊卫民著.—北京:

东方出版社,2016.11

(“私历史”丛书)

ISBN 978-7-5060-9386-6

I. ①对… II. ①熊… III. ①科学史—中国—20世纪 IV. ①G3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6613号

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20世纪中国科学界的人与事

(DUIYU LISHI, KEXUEJIA YOU HUA SHUO: 20 SHIJI ZHONGGUO KEXUEJIE DE REN YU SHI)

作 者:熊卫民

责任编辑:李 森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113号

邮政编码:100007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 次:2017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66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25.25

字 数:398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9386-6

定 价:52.00元

发行电话:(010)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85924602 85924603

序言：远去的历史与鲜活的证词

十多年来，熊卫民教授投入极大的心力从事中国现当代口述科学史的工作。他以记者的敏锐和学者的执着，孜孜不倦地追寻和打捞历史，总是能找到合适的访谈对象，让他们说出积淀在心中的故事，总是能挖掘出闻所未闻的史实，为读者揭开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这些年来，他完成和发表的口述科学史作品众多，堪称我国口述科学史的第一人。

读者现在见到的这部新著，是熊教授十余年来口述访谈的一些单篇作品的选集。其中所访谈的科学家，有郑哲敏、傅君诏、施履吉、沈善炯、邹承鲁、何祚庥、谈庆明、胡亚东等人。他们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较突出的学术成就，而且阅历丰富、个性鲜明，对人对事有独到的见解，能够言人所未言。他们个人的经历，也见证着中国科学的成长和曲折。这部书的访谈对象，还有巴延年、桂世茂、李毓昌、罗登、薛攀皋、宋振能等专职科技管理干部。他们虽然不如那些科学家知名，却是中国科技界不可或缺的一类人物。他们是不同时期共和国科技事业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者，由于特殊的工作性质，他们与许多著名科学家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亲历了诸多重大事件。对于他们的访谈，常常能揭开很多尘封的往事。

这些作品，大都在不同的专业刊物上发表过，读者面虽然不算很广，但其中一些甫一发表就赢得了专业读者的好评。现在结集在一起，将一个人物的经历，一个个单独的故事拼接起来，就构成了20世纪中国科学界一些重要的、有典型意义的场景。即使普通读者看起来也会饶有兴味，而且令人深思。

现代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日益密切。一方面，现代科学是社会进步的强

大驱动力，另一方面，现代科学的发展又深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共产党人对此早有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科技事业，在短短的十多年内就建立起规模浩大的科学技术体系，实现了从基础科学到重大科技工程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但同时，科技事业也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其他事业一样，曾经遭受过严重的挫折，特别是从50年代到70年代，因为知识分子政策的偏差，给包括科学家在内的许多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本书的大部分访谈对象，都无可避免地或多或少被卷入其中。作为亲历者，这些科学家和科技管理工作者的回顾了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经历，以及政治运动对科技工作的重大影响，从50年代初期的土改、“镇反”和思想改造运动等，到50年代中后期的批判胡适运动、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以及60年代的“四清”运动，直至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大时代的洪流中，他们俯仰沉浮，栉风沐雨，历尽沧桑。时过境迁，这些运动对于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冲击和影响，却逐渐为人们所淡忘。书中科学家和科技管理工作者的回忆，为正在远去的历史留下了鲜活的证词。

拒绝遗忘，不仅因为那些运动在许多科学家个人生命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还因为这独特的试验在世界科技史上的罕见，从中可以概见中国现代科技的兴衰得失及其因果。而对此，人们至今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大概这就是受访者和访谈者不顾老病、不辞辛劳地留住往事的原因之一吧。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过著名的“曹禺现象”，即一些知名的作者在1949年以后创造力突然消失，再也没有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与此相似，中国现代科学史上长期受诺奖情结的困扰，表明中国本土少有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和世界第一流的重大科技成果。本书从科学家和科技管理工作者的角度，提供了一些典型的事例，像施履吉、沈善炯等先生的遭遇，为人们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很好的案例。吸取历史教训，告别斗争哲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中国科学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这基本上是最近二三十年来的普遍共识了，尽管在实际工作中，一些旧思维的定式仍然多多少少存在着。

如果说政治运动对科技事业的影响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和改革开放的发展而很快消退的话，那么科技体制中的一些问题存续的时间之长，影响面之广，就更值得探讨了。书中涉及的科学界的“领导权”问题，就是我

国科技体制的一个基本问题，然而即使在经过科技体制改革 30 多年之后，不仅没有解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场合还更加突出了。

我国科学界的权力架构包括党的领导、行政领导和学术领导三个层面。“文革”以前，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主要特征，曾出现过“以党代政”、“以行政领导代替学术领导”等问题，给科技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如本书讲到的“大跃进”运动期间的一些突出事例，大概难以再现了。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吸取了这种“外行领导内行”的教训，力图要扭转这样的局面，但效果并不明显。最近 30 多年来，学术行政化代替了学术政治化，学术领导体系组织不健全，常常处于若有若无或沦为行政领导系统的附庸之境地。这种显而易见的问题，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时代却长期得不到解决。这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也是当前科技界各种矛盾的一个焦点所在，然而人们对此似乎视若无睹，或者讳莫如深。

为什么通行的学术共同体的规则在我国科技界遭到扭曲或不起作用？对此薛攀皋先生指出：“应当尊重科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让科研人员自主，让科学共同体自律，给科研机构 and 科技人员以充分的自由。换句话说，我们应当虚心学习西方花了几百年时间才建立、发展起来的行之有效的近代学术体制。”薛先生发自肺腑的经验之谈令人感慨。从 20 世纪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中国的科学共同体在 50 年代经历了以政治化为核心的重组，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还是没有建立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科学共同体，由于制度化建设的严重滞后，反而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了以新的人治为特征的问题。因此，重塑学术共同体，仍然是中国科技界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在阅读这本书稿，重温那些科苑往事之余，拉杂写下以上这些感想，难免偏颇，只是给读者思考中国当代科学的历史和现实提起一些话头。

是为序。

王扬宗
2016 年岁末

目录

前言：在科学与政治之间 / 1

郑哲敏：加州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

初到美国 / 10

梅贻琦没有动员我去台湾 / 12

参加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 14

为什么不留在美国 / 17

在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下 / 19

绕道欧洲归国犯了大忌 / 23

我和钱学森只是师生关系 / 25

傅君诏：从留学美国到土法炼钢

党组织决定我赴美留学 / 32

学成后艰难归国 / 35

恢复组织关系 / 39

预想和现实有很大反差 / 40

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等校任教 / 43

苏联专家和苏联教育模式 / 46

在北京钢铁学院主持科研部	/ 47
“马粪渣”与土高炉	/ 50

施履吉：天才回到中国后

北京生物学实验中心	/ 56
回国不易	/ 59
牛满江的 RNA 研究靠不住	/ 60

沈善炯：我亲历的政治运动

洗脑筋，改造思想	/ 66
我从来没有批判过胡适	/ 68
被怀疑给“胡风集团”通风报信	/ 70
上海分院的大鸣大放	/ 71
我也干了“荒谬”的事情	/ 73
广州会议让知识分子热泪盈眶	/ 74
我第一个被揪出来	/ 76

邹承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成长之路	/ 82
诺奖级成果只能在国内发表	/ 87
创造力从哪里来？	/ 94
对学术腐败说不	/ 98
中国科学发展存在的问题	/ 109

范岱年：中国科学院内的老浙大人

大批老浙大人调入中国科学院	/ 116
我在《科学通报》的工作	/ 119
我所知道的丁瓚案	/ 122
钱三强入党	/ 129

许良英遭批	/ 130
张明远这人品质很好	/ 131
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的反右派运动	/ 134
其他老浙大人	/ 138

何祚麻：在科学和宣传之间

许良英等被划为右派的深层原因	/ 144
思想战线的多个战役	/ 146
对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	/ 148
科学卫生处的成立	/ 151
也谈丁瓚事件	/ 153
张稼夫强调学术领导	/ 155
张劲夫更能干	/ 156
“超声波化运动”的内情	/ 157
秦川和赵飒	/ 160
钱学森和于光远之争	/ 162

巴延年、桂世茂：政治风浪中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

以学习为主的“三反”“五反”	/ 169
思想改造是重头戏	/ 169
学习苏联	/ 170
分院最安定的一段时间	/ 172
分院副研究员以上没划一个右派	/ 174
科学家如何“大跃进”	/ 177
神仙会和《科学十四条》	/ 181
贯彻八字方针，出现新生机	/ 184
王仲良调离，分院被撤销	/ 185

罗登：五六十年代的科研管理干部与科学家

- 帮科学家分忧 / 190
- 保护朱洗们“过关” / 193
- 大炼钢铁、超声波和深挖洞 / 198

谈庆明：早期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 建立力学研究所 / 204
- 我有“右派嫌疑” / 207
- “上天、入地、下海”及火钻 / 209
- 钱寿易深得钱学森重视 / 213
- “超声波化”和“除四害” / 214
- 爆炸力学的诞生 / 216
- 核爆炸波与爆破堆山 / 219

李毓昌：力学所早年的人和事

- 钱学森入党 / 228
- 钱学森和钱伟长的关系 / 230
- 晋曾毅无为而治 / 231
- 杨刚毅和钱学森之争 / 234
- 乱糟糟的“大跃进” / 237
- 林鸿荪、林同骥等从海外归来的科学家 / 239
- 张劲夫对施雅风“一分为二” / 244
- 杜润生组织政策座谈会 / 246

薛攀皋：追忆广州会议

- 领导干部带头检讨 / 252
- 科学家大提意见 / 256
- 陈毅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 259
- 大会总结和遗憾 / 262

薛攀皋：1964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

会议的背景和主题	/ 268
会上会下	/ 269
评价与思考	/ 276

薛攀皋：心理学科在中国（1949—1976）

丁瓚与心理研究所的筹建和降格	/ 286
陆定一等对心理所研究工作的全面干预	/ 289
周恩来等：心理所的任务要由心理学家来讨论	/ 291
康生等“批判心理学资产阶级方向”	/ 292
胡乔木对批判运动中的一些问题予以否定	/ 295
心理学遭受灭顶之灾	/ 297

薛攀皋：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定位与调整

建立学部与学术领导	/ 302
学部成为党组成员的办事机构	/ 307
“夺权”与撤销学部	/ 314
重建学部与加强学术领导	/ 316
学部变为咨询机构	/ 321
科研究竟应该由谁来管理？	/ 322

宋振能：我与中国科学院（1965—1977）

科学院的三线建设	/ 328
科学院机构改制	/ 329
“文革”后砸烂学部	/ 330
黄淮海办公室的工作	/ 333
“五七办公室”	/ 335
1972年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	/ 339
业务一组、二局、一局	/ 344

“三志”会议、植被会议、环保会议	/ 346
整顿科学院	/ 347
“百家争鸣”座谈会	/ 349
胡亚东：中外科学交流的恢复	
科技资料进口工作做得相当好	/ 354
与东欧国家的学术交流	/ 354
加入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	/ 357
恢复中国科协在国际科学联合会中的地位	/ 363
蔡德诚：钱学森和《科技导报》	
“你们《科技导报》讨论什么三峡问题？”	/ 369
勇于刊登不同意见	/ 370
朱光亚的一封信	/ 371
马赫与马克思	/ 372
媒体得有自己的风骨	/ 373
附录：如何提升口述史的可信度	/ 375

前言：在科学与政治之间

相比人文知识分子，科技知识分子人数更多，更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主体。他们也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二十世纪，也有很多五味杂陈的往事，还是许多国家重大事件，尤其是重大生产建设活动的关键当事人。但很少有科技知识分子来书写自己的故事。我们能在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中发现他们，可记者所做的报道常常只引用他们的只言片语，放入记者自行营造的语境中后，不免有曲解之嫌；作家在相关传记或报告文学中所创作的典型，又往往过于拔高，仿佛他们皆为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相比而言，对科技知识分子进行访谈，系统记录他们的话语，恐怕是保存其经历、见闻和见识的最佳途径。

自2000年以来，为收集中国当代科技史的素材，我有意识的对科技知识分子开展了访谈工作。十多年下来，经我访谈过的科学家、教授或科研管理干部不下百位，整理成文的访谈稿，也有几十篇之多。承东方出版社陈卓先生青睐，现从中挑选十余篇史学价值较大、比较适合大众阅读的文章出来，集结成册。

本书主要介绍20世纪中国科学界的人和事。在前面几篇中，按所述主要事件的发生时间，分别介绍几位科学家的成才之路，或他们留学归来后筚路蓝缕开展科研工作的艰难历程。

郑哲敏院士回忆了他通过层层测试考取“扶轮社奖学金”去美国留学的过程，在加州理工学院期间他与其他留美学子的交往，台湾方面以私人交往形式和大陆以组织形式对海外学子的争取，在回大陆、去台湾和留美国之间不同学子所做的选择，麦卡锡主义对加州理工学院的影响，他艰难

的回国旅程，绕道欧洲归国对他日后工作的影响等。其中，对不同学子在是否回归大陆问题上的考量的介绍，与在大众媒体上常见的宣传迥然不同。

作为科学家中的地下党员，傅君诏教授回国后相继在华北大学工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钢铁学院等重要高校担任实职领导，并直接向周恩来、康生等人汇报过工作，地位明显高于其他留学人员。关于科学家在“大炼钢铁”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他披露了惊人的史料。

施履吉院士思维敏锐，动手能力极强，留学美国时，被同学、老师公认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天才。可惜的是，花了几年时间、克服众多障碍回到祖国后，他却因与搞瞎指挥的行政人员发生冲突、受到一些老科学家的嫉恨、缺乏基本的科研条件、遭遇政治运动的冲击等原因，直到改革开放后才略微发挥才能。虽然他仍能凭短期内取得的一些成果而当选为学部委员，可毕竟此时的他已经老了。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他的遗憾之情溢于言表。他还介绍了他对当年的“明星科学家”牛满江的批评。

饱经迫害的沈善炯院士对政治运动耿耿于怀。他介绍了在王仲良等领导人的保护下，他间不容发地幸运通过“胡适批判”、“反胡风”、“反右派”等运动，以及王仲良调走后，他沦为“四清”运动打击对象的经历。蛮横批判所带来的精神刺激是如此的强烈，他的右眼一度基本失去视力。

邹承鲁院士回忆了他被日本鬼子从东北一路驱赶到西南，在轰炸中求学，一度从军远征印度、缅甸，然后退伍，考取英庚款出国留学，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在人工合成胰岛素等领域取得多项重大成果的经历。他还对影响个人成才，尤其是影响中国科学健康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重点介绍了为维护科学尊严，他与政界、商界、科学界一些不端人员多次论战的经过。

接下来是科研管理干部和科学家对所在机构一些人和事的回顾。

范岱年教授亲历了中国科学院早期的不少大事。在访谈中，他介绍了他和许良英等“老浙大人”（尤其是地下党员）于20世纪50年代初调入中国科学院后，先在“整党”运动中参与“淘汰”丁瓚等地下党员，然后自己在“肃反”、“反右”等运动中也遭到“淘汰”的经过。

作为50年代中宣部科学处的重要成员，何祚庥院士接触过很多高层人物，了解不少内部信息，他对范岱年访谈的内容有重要补充，并顺便为

自己在批判梁思成运动中的角色作了辩护。他关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宣部科学处和中国科学院那些人和事的回忆，是中国科技体制历史研究的有趣史料。

巴延年书记、桂世茂秘书长介绍了“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学习苏联、“肃反”、“反右派”、“大跃进”、“四清”等政治运动和“神仙会”、“八字方针”等调整政策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具体操作过程。他们的回忆不但可与沈善炯的口述相互印证，还展示出在铺天盖地的运动背景下，他们这些不乏疑虑但无力回天的科研管理干部的辛酸与无奈。

罗登先生长期在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担任管理干部，他介绍了他所了解的朱洗，他和王仲良等在反右派运动中成功保护朱洗等人，以及随后自身遭到批判的经过。从他的回忆可以看出一些平和的中下层科研管理干部应对上级的“左”倾政策的方略，以及遭到“逆向淘汰”的过程。

谈庆明教授和李毓昌教授都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元老，谈的都是该所的人和事，因他们当年地位有别——谈为研究人员，李为管理干部——正好相互补充。谈先生回顾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从创立（1956 年）到扩张（1958 年），从调整（1961）到“文革”早期的变迁历程。包括朱兆祥、林鸿荪帮助钱学森和钱伟长建所的贡献，钱学森、郭永怀的办所思想，“反右派”、“大跃进”、“除四害”、“超声波化”、“四清”等政治运动对力学所的冲击，爆炸力学学科在力学所的诞生，郑哲敏、钱寿易的学术贡献等。李先生重点回顾了力学所海外归国人员的经历，其中惊心动魄之处甚多，而他对钱学森入党自传、钱学森和党委领导冲突的介绍，读起来饶有趣味。

有“活字典”之誉的薛攀皋先生长期在中国科学院院部从事管理工作，从生物学部副主任的位置退下来后，他更是致力于深入研究他所亲历过的那些历史。本书收录了对他的四次访谈。第一、二篇分别介绍他亲历的 1962 年的广州会议、1964 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均有独到视角，是研究这两次重要会议的宝贵史料。第三、四篇分别介绍他所了解的心理学科在中国、学术领导在中国科学院的坎坷历程，许多戏剧化的场景让人既好气又好笑。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前副主任宋振能在中国科学院院部工作了近 40 年，“文革”期间仍然如此，他对 1965—1976 年的中国科学院的回忆，

尤其是1972年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的回忆，填补了不少历史空白。

曾任中国科学院外事局局长的胡亚东研究员回忆了1977—1982年间他陪同钱三强、卢嘉锡、周培源等中国科学界的领导，到欧洲和美国多次访问、开会，和来自台湾地区和国际科学社团的代表磋商，克服政治阻碍，使海峡两岸的科学界同行得以共同加入国际科技社团、坐在一起进行学术交流的过程。访谈涉及海峡两岸的不少学界名流，其中，卢嘉锡院士的那些轶事尤其有趣。

最后一篇访谈的受访人是曾主持《科技导报》十余年的蔡德诚先生。因为替彭德怀辩护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他主张媒体得有自己的风骨，他重点介绍了1990—1995年间钱学森四次向《科技导报》施压，或者说他四次顶住钱学森压力的经过。

需要说明的是，口述历史门槛虽低，但做好并不容易。不少人看不起口述历史工作，认为它不过是一个人说，另一个人记而已；记录者即使不是可有可无，那也可以随意替换。但实际发生的访谈，比这要复杂得多，访谈整理人往往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人的记忆会逐渐模糊，很多事情会想不起来，且人都有私心，对外人难免会有戒心，所以，不但回忆录中会有错误或谎言，访谈稿中也可能出现误导，且容易流于肤浅。所以，一次成功的访谈，必然是良好合作的产物。不但需要记忆力、表达能力均强的亲历者作为受访者，还需要受过良好训练、有平等对话能力的访谈整理人：他/她需要设计整个口述历史研究计划，选择和联络合适的历史当事人进行访谈，并在访谈前查阅大量的档案文献、准备众多细致的问题，在访谈中随机应变利用受访人的只言片语钩沉出一些鲜为人知的有价值的史料，在访谈后通过加注的方式进行大量的补充、印证、甄别、文字加工工作，将访谈稿整理到既真又美（至少不丑）、值得向学术界推荐的水平。以上每一个步骤都有难度。为了说明这一点，本书还在访谈稿之后，附录了一篇介绍口述历史研究心得的文章。

鉴于留存前人骨灰的意义较小，作家王力雄曾提出建立“灵魂纪念馆”，专门保存人们口述的人生经历的设想。我很赞同这个建议，很愿意和同志者一道，继续为这类为国民存信史的功德无量的事业添砖加瓦。

最后，请允许我向帮助过我的人致谢。我要感谢我的受访者。接受访谈时，他们年轻的也有七十余岁，年长的已有九十余岁。为了准确地留住

历史，多数人不辞劳苦地多次订正访谈稿。我要感谢我的合作者。其中，王作跃教授、王丽娜副教授和张志会副研究员在不同时间参与了部分访谈，李欣欣、樊玉娟、王丽娟帮我誊录了部分录音。我还要感谢樊洪业研究员、王扬宗教授和张藜教授，他们不但用自己管理的“中国科学院院史的编撰与研究”、“中国科学院专项：中国科学院院史编撰和研究”等项目资助了我，还在课题组日常的讨论中给我提供了不少启发。刘晓副教授、章梅芳副教授、王勇忠博士等同事或同行，在拍照、讨论、核对人名等方面给我提供过帮助。刘钝教授、王扬宗教授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对全书结构和一些篇章提供了重要建议。